

江南文化“铿锵北上”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扬州分院副院长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 刘怀玉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江苏大内斗”，会跳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标题，例如《大内斗省的江湖简史》，江苏如何或者为何成为“大内斗省”？似乎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江苏笃定与“大内斗省”有缘。本人一笑了之，实在不敢苟同。苏南苏北经济、文化等差异明显，甚至心理上有隔阂，确是事实，但伴随苏南苏北大规模有梯度的经济文化合作，江南文化“铿锵北上”，并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也是事实。

其实，黄河夺淮前的苏北并不比江南逊色。以我的家乡淮安市涟水县为例，宋熙宁八年，苏东坡即任杭州通判，经运河入涟水出淮河口北上前往山东赴任，为涟水旖旎风光所吸引，写下了《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注：浙江湖州）比”。古代的江南曾是荒蛮之地。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造成了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文化，和当地人共同创造了富庶文明的江南，唐宋以后，江南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多水，灵动的水是江南基本符号，江南文化的底蕴是秀而雅，又较多地融入了工商业元素和工匠创新精神，因此，很能经世济用，领风气之先。江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现象，颇值得咀嚼玩味。

江南文化既有输入，也有输出，而且以输出居多。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三百年中，“天堂”苏州和杭州曾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引领时尚潮流和社会进步。近代上海的崛起后，江南更是如虎添翼。由于古代陆路交通不便，大运河自然成为大江南北主要交通要道。江南的粮食、棉花、丝绸、茶叶等源源不断输往北方，还有大量的人文交流，运河成为重要的文化线路，杭州、苏州、扬州和淮安成为明清时期四大运河名都。属于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地带的扬州和淮安，自然具有南秀北雄的特征。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会把扬州当作“江南”，因为许多古书上就是这样写的。从文化意义上讲，扬州属于江南也并不为过。现代淮安城市精神被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何成钢

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宋代就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朝奉郎则是正七品。在徽州，朝奉却是一种普通使用的称谓，相当于今人惯用的先生。当年，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称“朝奉”。旧时上海地区，一般称典当铺子里的掌柜为朝奉。后考据学家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等的。一般称富人为员外，徽州多富商，所以称为朝奉。

徽州，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看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包含着过去的“六府一县”，而且还应该包含徽州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些地方。胡适在家乡编纂《绩溪县志》时，一再强调“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部画出路线，可看各部移植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胡适的“大绩溪”说的就是文化徽州。

大抵言之，徽商的主要活动地区，南则吴越，中则荆楚，北则燕都，结成了一个有机的商业网络。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徽人外出多半走水路。新安江是徽州境内最大的水系，它发源于祁门县，沿新安江顺流东下，起伏的山峦渐渐被开阔的平原所代替，眼前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沃土。这里就是商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淮浙盐场。再从苏浙地区沿运河往北，一路所经多为商贸辐辏的经济重镇，由此分赴河南、河北等地，直抵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这是由徽州出发往东经过的水路。

徽州境内另一重要的河道是昌江。由祁门县进入昌江，顺流而下，不远就是江西的浮梁。浮梁很早就成为一个商业交换的中心，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的句子。由浮梁再沿昌江前行便可到达“瓷都”景德镇。曲折折的昌江将舟船载入浩瀚的鄱阳湖，进而同长江相连。

此外，芜湖一直是徽商北上、南下、东进、西出运销货物的转运地。一代一代的徽州商人定居芜湖，把芜湖作为商业往来的大本营和桥头堡。在古代，芜湖有两条通往徽州的道路。一条是从芜湖沿西津河（水阳江）乘船



徐宿淮盐铁路连接江苏徐州、宿迁、淮安、盐城4市，线路全长约300公里，全程设计行车速度为250公里/小时，是江苏腹地重要的铁路大动脉之一，被誉为江苏铁路的“金腰带”。目前，徐宿淮盐铁路正加紧施工，预计2019年底达到通车条件。

点化为“包容天下崛起江淮”，显示出个性化的气度和担当。今天淮安、扬州正在建设南北融合、开放包容的淮扬文化高地，其中就有不少江南文化的元素。

今天江南文化“铿锵北上”，得益于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积极推动，江南经济重镇和文化高地的溢出效应。受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江南既要“腾笼换鸟”，也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苏北成为首选之地，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成为强大“助推器”。苏北许多城市将会受益，去江南招商引资成为苏北发展的重中之重。前些年，苏州与宿迁、南京和淮安等苏南城市和苏北城市结对，推动扬州、泰州、南通等地跨江融合发展，推动宁镇扬一体化，推进扬子江城市群建设，都是为江南经济文化梯度转移“铺路”。

如果说过去主要靠运河纵向传输，那么今天则靠运河和长江形成十字形全方位传输。今年2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纲要》，力推大运河文化带，为江南运河和苏北运河大规模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制度安排。江苏境内长江干线总长803公里，按现有规划，要建36座过江通道，“天堑变通途”、“苏南苏北一线牵”将成为现实。过去人们常说“南通难通”，现在通江达

海的南通发展势头强劲，从“上海北”到“北上海”，还要做上海“北大门”。上海有一块“飞地”在盐城。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在盐城大丰划出一片土地作为上海垦区，把海涂荒原开辟成上海粮食和畜禽生产基地，成为正宗的“北上海”。上海大丰农场成为盐城连接上海的“桥头堡”和“纽带”，也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挥之不去的“乡愁”。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沿江不靠海的淮安已经吸引了1200多家台资企业，投资总额120多亿美元。2014年，淮安获国台办批准为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淮安台资集聚起初靠的是人脉关系，后来植入了昆山的亲商富商安商理念及其模式，逐步形成了“101”服务平台，“101”就是100%+1%，100%是按照办事的程序，让台商100%满意，还有1%服务是台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惊喜。中国台湾有著名的101大楼，淮安“101”服务也可能成为品牌。2017年5月，《淮安市—昆山市台资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顺利签署，淮安全面加强同昆山的对接合作，加快复制推广昆山的优势和经验。随着2020年6月连淮扬镇高铁和2021年宁淮铁路贯通，苏北腹地淮安构成“米”字形铁路枢纽，中国运河之都淮安将多几分中国台湾风情和江南文化，“包容天下崛起江淮”指日可待。

徽州与江南

至宁国河溯溪，然后登岸南行，越从山关，入绩溪达歙县；另一条是从芜湖沿徽水（青弋江）乘船至泾县，然后登岸南行，经旌德，越新岭关，入绩溪达歙县。由此可知，早在唐宋时期，由徽州经宁国至芜湖的道路就已经畅通无阻了。

与徽州毗邻的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徽州人持续性移民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徽商在上海的活动，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明万历年间的《云间杂识》记载：早在明代成化年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这是有关徽州人在上海地区经商的最早记载。位于长江口的松江府是明清时期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吸引了众多徽州人前往经商。在一些史志里，多有“贾松江”“贾云间”“居云间”“商游吴淞”“业贾上海”“贾于嘉定”的记载。徽州人对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单纯地在客地经商和深入地移民定居两种状态。

客地经商是徽州人在上海市镇移民活动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如地方志和乡镇志记载：嘉定县南翔镇“因寺而得名，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宝山县大场镇“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商业首推布匹，棉花次之。”从山陕布商、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盛”。显然，徽州人的商业行为成为很多上海市镇兴衰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经商行业的分布上，充分体现了徽州人既充分利用家乡独特而优越的自然环境，又紧密结合上海市镇经济发展的特色。明人叶梦珠说：“松民贸易半仰给于纺织。”《外冈志》说：该镇“四方之巨贾富殖，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到了清代乾嘉之际，棉花更是“近镇遍栽，以资纺织”，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黄渡镇、娄塘镇、真如镇、南翔镇、广头镇、安亭镇等市镇中。当年徽商主要经营活动是“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棉纺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区域内外粮食贸易的发展和需求。据万历《嘉定县志》称：嘉定县形成“以花织布，以布易粮，以银余米，以米兑军运”的经济格局。早在明代，旅沪徽州商人已将各种家乡产的茶叶销到上海地区，而清代以后经营茶叶生意的更有增无减。胡适先生出生在安徽绩溪茶商的家庭，乾嘉年间“先曾祖考创开方和字号茶铺于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资生。”徽州茶商大量来沪的时间大体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明清时期徽州盐商在上海地区十分活跃。当时，苏、松两府是行销浙盐的口岸之一，上海地区行盐的商人几乎全是徽人。上海地区典当业是继棉纺织等而发展起来的，同样构成明清时期上海

市镇繁荣的重要元素。据载“布庄开张，典商望风而至，百货骈集，遂成闹市，而镇终始有殷实巨户矣。”如明代嘉靖年间歙县著名典商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质铺规模极大，“里中富人无出杜士（汪通保）右者”。此外，徽商还有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从事木商生意的。

也有相当多的徽州人选择在上上海市镇中扎根下来，由客居转化为土著。徽州人，在上海地区乡镇志的人物传记中大都未被列入“流寓”一目，表明他们已经被视同本地人。徽州人在上海市镇中移民定居的主要方式为：一是注重与地方精英文人的文化交流活动。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休宁人程嘉燧，他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并称为“嘉定四先生”，是明末一大诗人，善丹青，又与董其昌、杨文驹、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李流芳并称“画中九友”。李流芳也是徽州歙县人，在南翔镇金黄桥建棧园，园内宅壑幽邃，疏朗散淡，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为嘉定地区的诗坛中心。二是积极培养子弟在定居地读书入仕。徽州移民在上上海市镇中占籍科举成功的不乏其人。如《重辑长堰志》“清，黄枢，徽州籍”，《石冈广福志》“明，戴冕，祖某，休宁人”均科举成功，完成了由外地到本土、由贾到儒的转变，从而最终为实现在上海市镇中的身份转变，成为望族创造条件。三是积极参与乡镇志的修撰。地方志书的编纂是一种文化权力，是江南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之一。如金山县《干巷志》《朱泾志》的纂修者朱栋，就是徽州籍移民的后代。《南翔镇志》的修订者程枚熙也是徽州移民的后代。四是注重宗族组织的建设。徽州人定居上海后，把宗族组织搬到入籍地，以壮大其地方势力。徽州人还会通过联姻以及各种慈善义举来进一步加深融入上海市镇的进程。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近代大都市崛起的中心吸引力和商机，徽州人更是选择集中到大都市中发展。移民也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显著标志。

开埠之初，整个上海县人口总数不超过25万人，但到1942年，上海的人口已高达392万，至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人口已增加到554万，其中非本地籍人口471万，占总人口的85%。1950年初，迁入上海的人数超过100万的省份有江苏、浙江，超过10万的省份有广东、安徽、山东，超过1万的省份有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人口构成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安徽移民，其中徽州人表现非常突出。他们开始改变开埠前散处于上海地区所属各县城乡的广大城厢、村镇和集市的面貌，逐渐汇聚于上海县城之内。

长三角新支点在哪里？



王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王健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考察近代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知，名扬天下的“大上海”是撬起江南、长三角乃至中国发展的支点之一。如今，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撬动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新支点可能在哪里？不妨先了解一下上海发展的三个空间维度。

第一个维度：海洋与长江的支点。回眸历史，从古代到上海开埠前，长江早期与海洋的交汇点处于变动之中，从扬州、镇江一线，之后向江阴、太仓、宝山方向推进。隋唐的扬州正处在大运河与长江、长江与海洋的交汇点上，全国的水路中心，成就了国际性都市的地位。

南宋以后，杭州成为都城，也是南部中国的水路中心。元统一后，重开大运河，裁弯取直，但并没有真正通航，漕运走海路，临海的太仓刘家港成了海运中心和国际码头，有“六国码头”之称。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就是从这里起航。这是因为刘家港依托了娄江，有著名的至和塘，从太仓经昆山水路直达苏州；那时苏州已经成为太湖流域水路的中心，上海则是苏州的沿海“边缘地带”。

外贸港口，宁波的地位也很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苏浙一带的商人，从停泊于宁波、杭州湾钱塘江口的英美走私趸船上，将英国毛织品、鸦片等，用帆船经上海县南部河道辗转运输到上海县城。当时外国船只能直接开进吴淞口，进入上海。

然而，即便是东南沿海的宁波，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到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说，宁波的银铜价格是由苏州决定的。“刚到宁波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偶尔来到浮桥附近的一条街上。那儿挤满了一群情绪激动的人，他们发疯似地大叫大喊并且打着手势。我以为是遇上了骚乱，便转身问别人在这儿的吵闹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来到期货交易所。交易都是口头完成的，一旦交易完成，双方便握一下手，然后退到旁边去完成交易的细节。当时正在进行的是用西班牙银圆兑换铜钱的交易，其牌价是从两百英里之外的苏州用信鸽带过来的。眼前那熙熙攘攘的场面使我清晰地回想起巴黎证券交易所那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宁波的钱庄业一向发达，但仍要看苏州的脸色。收购生丝有所谓的“苏州制度”，就是宁波商人杨坊为怡和洋行设计的。

上海开埠之后，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外国船舶已纷至沓来，然而，东南沿海航线上，还没有形成以上海为聚会点的南中国海航运网络，还出现过以广州一带为聚会点的东南沿海网络。直到1857年后，凭借长三角广大的腹地，丝、茶等出口大增，以上海为聚会点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初基本形成。

第二个维度：黄浦江与长江的支点。上海的兴起与黄浦江有关，黄浦江与长江形成了T字形结构。开埠之后，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在西岸兴建码头、仓储，建立洋行，搞地产，上海兴起。根据光绪十三年

（1887），游历日本及美洲的清朝外交官浙江德清人傅云龙的说法，当时上海海关管辖的范围很大，大致今上海、江苏泰州、常州以东的长江两岸各口岸，都在上海海关的管辖范围。这些口岸的南岸，大多有河流与江南运河相通，北岸则有通畅运河与江北运河相通。江苏长江南北腹地，特别是苏南江南运河以北的各水道可入长江，再由长江经上海吴淞口进入上海或入海下南洋。或者由黄浦江、苏州河进入上海，再由黄浦江出海。沙船贸易和漕粮海运很早就在上海兴起，就是由于四通八达的水道沟通了上海港口与腹地的联系。

第三个维度：黄浦江与吴淞江的T字形支点。傅云龙指出：“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吴淞之要害在李家口。”这是上海与长三角，特别是沟通太湖流域最紧密的支点，也是上海在1895年后持久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黄浦江发源于太湖的淀泖地区，原本是吴淞江的支流，但“后来居上”，黄浦江因淀泖之水而疏浚贯通，成为长江入海处的最大支流，吴淞江反而成了其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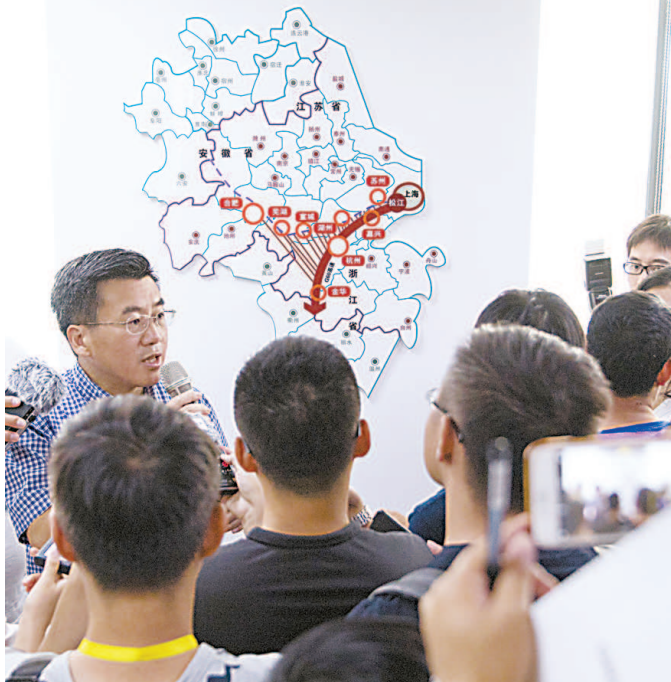
吴淞江与黄浦江水道都伸入江南腹地，吴淞江直接与江南运河沟通，沟通了上海与苏南。吴淞江之口原在吴淞口，后来为黄浦江所夺，实际成了黄浦江之口，由此出长江，由长江通海，前往南洋。显然，真正深入长三角腹地的不是黄浦江沿岸，而是溯苏州河而进入到的苏州。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航运权并没有对列强开放。在条约中规定，禁止外商到乡村任意游行，常住，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原因是清政府害怕外国列强深入自己的经济腹地。当时严格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江苏腹地，苏州的开放相对比较晚，曾有一些传教士从上海乘船前往太湖，是偷偷摸摸行动的，并引发了纠纷。后来，上海通往苏州、嘉兴的内河航路被打开，上海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三个维度对上海的发展各有其意义。第一个维度，上海沟通中国与世界；第二个维度，黄浦江沟通长江与上海；第三个维度，吴淞江沟通上海与长三角，特别是太湖流域。吴淞江从吴县松陵鲶鱼口东流，与运河平交，而吴淞江在松陵沟通大运河，形成北上南下，在平望交汇后，可往浙江的湖州南浔等地，或到杭州。民族资本从江南运河沿线向上海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湖淀泖地区地势低洼，湖荡众多，近代黄浦江上游沿岸并非上海发展的腹地，特别是松江府所在地区，像往浙江嘉兴方向地区，发展明显不如苏州河方向，这与水路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及苏浙腹地的发展水平有关。1958年后，江苏多县划入上海，上海的发展空间成倍扩大，上海的宝山、松江、金山等区县不断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轮发展，长三角企业依托邻近上海的地缘之力，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逐步发展起来。苏南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的第二轮大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浦东大开发，上海的空间由浦西向浦东扩展，由此形成黄浦江两岸与吴淞江两岸的均衡发展格局。苏浙呼应浦东开发，积极跟进浦东新区建设，苏州建工业园区，从交通建设等方面主动积极接轨上海，形成长三角区域开放的整体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聚集区。

未来的竞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建设成为新的发展目标。长三角城市群要立足于世界级城市群之林，既要有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引领，也要靠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鼎力支撑。未来长三角的优势在哪里？在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品牌，在于上海在交通、航运、金融、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更关键的是，苏浙皖的广阔空间和经济、文化和人才支撑。目前，区域发展正在向更加广阔的纵深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正加快推进，未来可能成为撬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支点。

G60科创走廊规划布局图



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一名负责人介绍规划分布图。

三年以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名称变更了三次：从最早的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到后来的G60科创走廊，再到现在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三年里，不仅仅是名称变了三次，G60科创走廊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年均增幅37%。

G60科创走廊是利用长三角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等特点打造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将成长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华社发